日本1990年清史研究概况

艾　平编译

一、清(1840年以前)

1990年日本的清史研究，涉及各个领域，以下分别略作介绍。

经济　1990年的情况与近几年相同，对经济政策、市场情况、货币职能、商品流通等问题的研究较多，而小农经济的特征和商人的经济伦理这类有关个别经济主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为了加深对清代经济社会的了解，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足立启二《明清时期钱经济的发展》(《中国专制》)，指出由明至清在全国范围，包括落后的农村地区，作为流通手段，适应性很强的钱排斥银扩大了其流通范围，从而出现了“由银经济向钱经济发展”的过程。作者对铜钱的货币职能进行了研究，并把市场经济的发展视为铜钱流通圈扩大的原因。党武彦《乾隆初期的货币政策》(《东洋史论集》，〈九州大学〉一八)探讨了乾隆初期“钱贵”之际，在京师实行的货币政策和乾隆十七、十八年在直隶省囤积铜钱的问题。山本进《关于清代市场论的考察》(《历史学研究》六〇三)，在分析以往有关清代市场结构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直接生产者在生产、销售之时并没有受到经济以外强制力量的影响，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的农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动来调节供给，这就决定了清代市场是并不体现阶级关系的自由市场。并且，清代是区域分工的发展时期，作者据此指出，从清代中期开始，在一部分地区，区域市场开始向省市场圈发展，省市场圈则沿袭了省内区域间的分工。适应全国市场的需求变动情况，在自主性较强的一些地区，作为省市场圈核心的大都市发展起来，而趋向全国形成统一市场的要求则并不强烈，以至出现了清末民初的分裂局面。不过，虽然这一课题以往还未曾有人从正面加以论述，但是，文中关于全国市场的概念尚不明确，再者清代的全国市场是否是一个几乎不受海外贸易影响的封闭体系，此点亦有疑问。山本进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广东的商品生产和广西的大米流通》(《东洋学报》七一——三·四)认为，清代中期，广东糖业的发展造成省内大米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广西的大米生产优势使其得以向广东提供粮食，并经由广东向江南换取棉花，可以说广西大米流通情况是基于两广种植分工的不同而产生的。则松彰文《清代中期浙西的粮食问题》(《东洋史研究》四九——二)，结合清朝的经济政策，论述了当时的米谷流通问题。文章指出，在清代中期以前，浙西的米谷供应包揽了长江一带的米谷流通领域，官府所需的粮食也有赖于此。自浙西米贵问题产生后，为补充完善长江一带米谷流通政策，乾隆二十四年，开始由福建仓储向浙西供粮，并由浙西商人负责运输、贩卖。此后，这一作法在浙西地区一直沿袭下来。这一粮食流通政策，对于稳定粮食调配和促进商业流通，都取得了实际的效果。近几年来，有关乾隆中期经济政策的研究有所进展，比较而言，对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经济政策的研究则由于史料方面的限制还较为薄弱，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社会　宗族　宗教　岸本美绪《明清时期的乡绅》(《权威和权力》,〈面对世界史的问题7〉,岩波书店),为考察乡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认为,与其把乡绅视为地方上具有排他性的领导者,不如把它看作是与其他各种势力(宗族、宗教组织)并存的地方核心力量之一。这与以往侧重把乡绅作为地方统治者来加以考察的作法是明显不一样的。文章还指出,人们选择乡绅作为保护者,是由于他们在地方上具有实际的保护能力,而这种保护能力可使很多人聚集在其荫庇之下。这表明作者是把乡绅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反馈形态来加以理解的。山本英史《绅衿包揽税粮和清朝政府》(《东洋史研究》四八——四),根据对绅衿包揽税粮事例的分析,论述了绅衿在地方所起的支配作用以及清朝政府对此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十八世纪初叶,当土地所有者直接纳税的原则确立之时,绅衿的包揽也相应发展为大规模的侵占税粮,并盛行全国。究其原因,在于绅衿对地方行政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普通民户为了免遭官府的掠夺,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诡寄投入绅衿名下。清朝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在雍正年间曾对此实行了严厉的取缔措施,然而一些禁令在乾隆年间就不得不缓和了。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严厉的禁令之下,绅衿包揽现象依然存在并发展,这说明在征税方面,清朝政府的控制并不能排除绅衿在地方上的支配作用,因此改而采取面对现实的措施。山本对以绅衿为核心形成的包揽集团所作的分析,与上述岸本的看法有共同之处,但山本更重视包揽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

铃木博之《清代的族产》,(〈山形大学〉十),以徽州府歙县包括许荫祠在内的许氏关系文书为主要材料,对清代族产的变动情况作了分析。从许荫祠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包括同族各个不同的宗族组织在内,族人的所有权和收租权也包含在族产范围之内,从而形成了分散的大土地所有形式。涉谷裕子《明清时期徽州江南农村社会的祭祀组织(一)(二)》(《史学》,〈庆应大学〉五九——一、二、三),根据对南京大学所藏徽州文书中的《祝圣会薄》这一祭祀活动组织的帐本所作之分析,说明了祝圣会的仪式内容、组织构造,以及活动方式等情况。并以祝圣会为例,考察了当时农村社会祭祀组织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祝圣会的祭祀有着维系地域内各个集团互相联系的作用,地域内的各种关系也以祭祀为媒介结合到了一起。滨岛敦俊《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社"和土地庙》(《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对土地庙和"社"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个村落拥有同一个土地庙的情况比较多见,以这个土地庙为中心所形成的地缘社会集团称为"社",信仰、祭祀乃至乡村问题,都依靠"社"来解决。大沢显浩《明末清初的密密教》(同上)介绍了明末清初受罗教南传影响而流传于福建、江南两省交界处的密密教的信仰形态及其成员情况。伊原弘介《清朝乡村统治结构(二)》(《研究报告》,〈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二六——一),在广泛搜集方志史料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顺庄组织、功用,以及顺庄法在湖州、杭州二府的实行状况。作者认为,顺庄组织在地方上与征税、治安组织以及里甲制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清代乡村对土地、人口的统治机构。

政治　军事　法制　渡边修《江西提督金声桓及其叛乱》(《东洋史研究》四九——三),在介绍了金声桓叛乱前的活动和叛乱经过之后,还阐明了清初汉人武将的地位以及入关后清政府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谷口规矩雄《金、王之变及相关的叛乱》(《研究集录》,〈大阪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三八),探讨了同一事件。作者论述了金(声恒)、王(得仁)之变前后赣州地区明清势力的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叛乱集团、秘密宗教结社,以及佃户们有组织的反抗等情况,并指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藩之乱发生。山田耕一

郎《清初对捐纳出身者的政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认为康熙年间官场中捐纳出身者的比例较人们现在所认识的要多，为了实行监督，除了对捐纳出身者定立规章外，对由党徒、家仆等冒名顶替之弊也予以纠弹。

在法制史方面，寺田浩明《关于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中“法”的位置》(《思想》七九二)，介绍了滋贺秀三、中村茂夫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即“法”在清代司法制度和人命盗窃重案审判理论，以及州县自行审判理论中的地位，并且指出社会秩序的形成问题，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作者认为，把民间秩序的形成与官方经营的作用分开来论述是困难的，不能把国家和社会分为两部分来进行对比分析，而应该把两者统一在一个秩序结构之中来确立其各自的位置。文章进而指出，把官方的行为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来探讨显得论据不足，如果要阐明民间的秩序状况，那么，以皇帝至上为中心而构想所有秩序形成情况的统治论，也有片面之处。因此，作者预测今后对于此类问题还会展开进一步的探讨。陈青凤《清代刑法中的妇女差别》(《东洋史论集》〈九州大学〉十八)认为，清代的刑法从维护宗族制度的立场出发，在伤害杀人、奸淫等罪方面增加了比唐律、明律更为严厉的歧视妇女的规定。中村正人《清代刑法中的正当防卫问题(一)》(《法学论丛》，〈京都大学〉一二七——一)，在论述清代刑法中所谓正当防卫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违法及其责任的定义。

东北地方史 川久保悌郎《柳条边墙之管见》(《东洋学报》七一——三、四)，从清初辽东地区各民族的关系着眼，论述了这一地区作为复旧政策一环的柳条边墙筑设情况。筑设工作是在清朝政府招民开垦辽东地区这一复旧时期进行的，柳条边墙在东北地区划分了满汉混住区域、满族和通古斯居住区域及蒙古族居住区域的行政区界。细谷良夫《清朝勃兴时期的史迹》(《秋大史学》三六)，在联合调查的基础上，以辽东边墙、城郭为中心，介绍了清初的有关史迹。

文化思想 冈本《清代禁书(下)》(《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一二)，是作者在1977年所发表的同名论文之续编。这是通过研究清代禁书来探讨清初文人思想的力作。在明末清初不安定的环境中，禁书作者的表现打破了传统的文人形象，他们思想活跃，并把自己独特的思考运用于现实社会。然而，个人的见解并没有集结为时代的声音，传统的社会和学术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动摇。三浦秀一《彭绍升和戴震的思想圈》(《东方学报》，京都六二)，根据戴震和彭绍升的往来书信，研究了他们的思想情况。马渊昌也《明清时期人性论的发展与许诺》(《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论述了许诺人性论的概况及其在明清人性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二、近代

现在对于近代的划分，是以对中国近代史的既有认识为前提的。从目前来说，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课题，有必要考虑其与明清史，特别是与嘉庆、道光时期研究的关系。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由于受到各自所掌握史料的限制，明清史研究者和近代史研究者的分界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们都十分需要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至少要进一步把握中国近代史的架构，就不能不对嘉道时期的国家史、经济政策史，以及区域史等方面进行研究。以下分别介绍有关“近代”时期的研究成果。

政治 并木赖寿《苗沛霖团练事件》(《历史与文化》，〈东京大学〉十七)，探讨了

苗沛霖团练自形成至崩溃的情况。苗沛霖虽然是为了对抗捻军而组织了“官练”，但却掌管了地方税粮征收、水运、关税、厘金局等事宜，行政权力扩大，出现了重新划分地方领导权的倾向。清朝政府对苗氏进行笼络，但苗沛霖却采取机会主义的对策，分别与太平军、捻军保持着关系。这种情况说明，一旦独自经营管理团练势力所辖范围，就能对抗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清水稔《关于康有为变法的考察》（《研究纪要》，〈佛教大学〉七四），以教育改革为中心，探讨了变法改革的内容，对以中央集权国家为目标的改革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大里浩秋《光复会成立前后的事情》（《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一二），通过对《浙案纪略》的考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批评总结，进而详细论述了光复会的成立经过（未完）。

人物研究 佐佐木正哉《湖南守旧排外派与开明派系谱（二）》（《近代中国》二一），主要阐述至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郭嵩焘的事迹。佐佐木杨《郭嵩焘的西洋论》（《论文集》，〈佐贺大学〉三八——一），考察了郭嵩焘居英时期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国现状及历史的把握。作者指出，郭嵩焘虽然通过对议会政治、财政、学术、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发现了西洋政教的本质，但却仍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很大制约。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一书（阿吽社），围绕孙中山与吴锦堂的关系论述了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狭间直树《从宋教仁看传统与近代》（《东方学报》，京都六二），根据宋教仁日记，论述了其立足于传统所确立的思想。田中比吕志《宋教仁的“革命”观》（《历史学研究》六〇九），则着眼于政治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宋教仁的革命观，认为其内容是建立在对现实实际认识之上的武装起义和政治革命。

中外关系 冯正宝《义和团运动时期宗方小太朗的活动》（《日本历史》五〇五），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认为宗方小太朗的活动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村义《关于湖南轮船株式会社》（《辛亥革命研究》九），以白岩龙平的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湖南轮船株式会社的成立经过，着重分析了该社与日本经济人士的关系。目黑克彦《关于清末禁烟运动的记录》（《研究报告》，〈爱知县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三九），说明了1909年的万国禁烟大会及其背景诸问题。户濑一惠有关《清末新教教会布教的最近研究》（《近代中国》二一），论述了基督教的有关问题。笼谷直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自亚洲的冲击与日本的反应》（《历史学研究》六〇八），指出中国贸易商人的活动提高了中国对亚洲国家贸易的比重，从而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影响。

财政 细见和弘《清末官办军事工业在国防生产中的发展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纪要》，〈龙谷大学〉人文科学一一），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论述了官办企业的经营危机，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对立所造成的。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光绪新政时期官办军事工业的重组过程》（《东洋史苑》，〈龙谷大学〉三四、三五），根据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指出了中央与张之洞、袁世凯所存在的矛盾。饭岛涉《中国近代的常关制度》（《社会经济史学》五六——三），以营口常关和牛庄洋关为例分析了常关、厘金和洋关三种制度之间的关系。高桥孝助《中国的常关·厘金·海关》（《移动与交流》，〈系列世界史之问（3）〉，，岩波书店），考察了清朝政府在征税方面控制商人，掌握商品流通的情况。

经济史 企业史 本野英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买办登录制度的挫折和出口交易机构的改变》（《史学杂志》九九——七）对1866年恐慌前后的贸易交易、清帐方式进行了探

讨。铃木智夫《关于招商局的内河进出问题》(《纪要》,〈岐阜药科大学〉二),介绍了七十年代《申报》对轮船招商局所作的评论,指出这些论说对招商局基本上采取支持、拥护的立场,但也有对招商局的批评,并且这些批评与改良派对洋务企业的批判大致相同。松浦章《清代末期的沙船业》(《文学论集》,〈关西大学〉三九——三),指出沙船业在近代逐渐衰退,以至商人要求解除禁令,以允许外国船只运送东北大豆。小濑一《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恐慌"》(《一桥论丛》一〇三——二),对这一时期各地的金融恐慌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基于信用而建立的结算机构问题造成了地区经济的混乱,而结算关系的动摇又使流通领域受到影响。古田和子《制丝技术的传播和社会结构》(《生活的技术》),研究了生丝生产技术在上海、湖州、信州等地的传播过程,揭示了各地区社会反应的差异以及中国市场结构的性质。

社会史　社会组织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田仲一成《粤东天地会的组织和活动》(《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一一),论述了广东东部的天地会、双刀会、吴忠恕军的活动及其余党在香港、新加坡的发展。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个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史学杂志》九九——二),对《柳兆薰日记》作了定量的分析,探讨了乡绅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夫马进《清末的保婴会》(《规范与统合》,〈系列世界史之问(5)〉,岩波书店),通过婴儿养育问题论述了清末的社会结构,考察了明末清初以来的育婴堂和清末保婴会的有关问题。西川正夫《四川泸州的记录》(《论集》,〈金沢大学〉十),根据体仁堂醵金簿底册和族谱,对清末民初泸州的乡绅进行了研究。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对华北农村社会历史的分析。路遥、佐佐木卫合编的《中国的家庭·村社·诸神》(东方书店)一书内,收有这一领域研究的多篇论文。其中,佐佐木卫《近代华北宗族集团的分化与组合》整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小林一美《家产均分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指出不能把地主阶层等同于封建领主阶级,认为地主阶层是组成中国国家、社会乃至历史的重要因素。佐藤公彦《天主教徒布教和乡村社会》,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的增长,与外国天主教势力的分裂、对立有关。久保田文次《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就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是很大,抑或是有限的问题,重新探讨了以往的研究,认为棉纺织品的流入对传统手工业几乎未发生破坏性的影响,但作者也以山东土布市场的丧失为例,指出地域的停滞和衰退实际上加速了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此外,神户辉夫《再论少数民族起义的领导者田四浪》(《研究纪要》,〈大分大学〉一二——一)和《关于云南回民起义的调查资料》(同上一二——二),则研究了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

思想史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载于《朱子学的思想》(有田和夫、大岛晃编,汲古书院出版)一书的有:有田和夫《清末士人的意识》、高桥良政《反太平天国运动者的思想和朱子学》、石黑宣俊《对魏源士大夫意识的考察》、宫村治雄《梁启超的西洋思想家论》、三石善吉《中体西用论的谱系》,等等。此外,三石善吉的另一篇文章《传统国家内在发展的途径》(《中国——社会与文化》五),就中国内在发展的问题,从延续中国社会上千年的儒学入手,探讨了官僚士大夫的思想和中体西用论,指出中国近代的发展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儒家伦理色彩的内在性的发展。

史料　工具书　有滨下武志、李焯然、林正子、张士阳合编的《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

(下转第95页)

展史可比。事实上清代东北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如封禁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四种统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城镇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反抗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思想文化的变迁等等，都不能用1840年为断限，将它们截然分开，也不能将东三盟排除于这些问题之外，从而割裂这些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完整性。《清代东北史》这种将东北在时间和空间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为其他的断代地方史的研究和著述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先例。书中五章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东北的整体结构来安排的，前三章主要是从政治上叙述清代东北的历史进程，从清政权的建立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其中包括明清战争、抗击沙俄、多种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东北范围内）、封禁东北、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及辛亥革命在东北等重大内容；后两章将清代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单列出来，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社会背景加以叙述。这样的章节安排既便于人们了解整个清代东北史的全貌，又便于人们以此为线索进一步研究清代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此书的下限截止于东北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前夜，叙述了军阀张作霖勾结官府绞杀辛亥革命，用爱国志士的鲜血换取了更高的官职，并叙述了东北出现军阀统治的某些社会原因，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清末奉系军阀的兴起和发展，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六位作者都是多年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擅长的领域。他们的写作分工则基本上与他们的专长相吻合：李燕光、徐恒晋先生负责清入关前部分；杨余练负责清入关后的东北部分；冯年臻负责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东北部分；王革生这位清代东北经济问题的专家负责相应的部分；曾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张玉兴先生则负责清代东北文化部分。作者们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同时又在现有的条件下吸取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清代东北史的研究成果。

令人惋惜的是，此书的主编杨余练先生在将整理完毕的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便猝然长逝了！其后张玉兴先生按出版社的意见继续修改此书，终于完成了杨余练先生未竟的事业。在《清代东北史》一书出版之际，谨向我所尊敬的先辈、清史专家杨余练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此书的问世不仅是我国清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对杨余练先生的最好告慰。

（上接第117页）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中村哲夫的《关于清末地方习惯的调查报告》（《布目论集》），泽谷昭次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地方志》（《东亚经济研究》五一——三、四），等等。此外，市古宙三监修、冢濑进编集的《近代日中关系史论文目录》（龙溪书舍）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和日本史研究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有益工具。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0编第5号《1990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张士阳和饭岛涉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翻译时去前舍后，只摘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但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